

夏商周秦汉时期黄河流域体育文明探赜

——源于宗教祭祀仪式的“二重证据法”

徐耀铎^{1,2}

(1.西北工业大学 体育部,陕西 西安 710072; 2.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摘要】:通过文献资料、历史钩沉、文化叙事、辩证分析等方法,借助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的相互印证,探索体育文明的起源、演化和文化哲理,并采取举隅“二重证据法”以勾勒黄河流域早期体育文明原貌。研究认为:黄河流域体育文明生成受“绝地天通”巫觋改革的影响,启伐有扈、钧台之享可以推断军事、宗教祭祀仪式构成黄河流域体育文明起源的两大学说;在自然宗教、多神教、宗法礼仪变迁中孕育夏商周时期黄河流域体育文明,封禅畋祭宗教、儒道修身养生宗教则是主导秦汉时期体育文明延续的文化空间;夏商周体育文明表现为意识主导下的“祛身化”,秦汉体育养生文明实践了身体本位回归;黄河流域巫觋演变为天神、地祇、人祖概念实践着巫觋文化向体育文明的转向,“祀”与“戎”、“雅”与“俗”是重武习射、图腾崇拜,以及宗教祭祀仪式“退场”后多元体育文明诞生的文化逻辑。

【关键词】:体育文明史;黄河流域;夏商周秦汉时期;宗教祭祀仪式;考古学;二重证据法

【中图分类号】:K221;K232;G8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656(2023)05-0030-10

DOI: 10.15877/j.cnki.nsic.20231115.001

黄河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脉,东临渤海,南至秦岭,北抵阴山,主要流经青、陇、宁、蒙、秦、晋、豫、鲁8个省份^[1]。《汉书·沟洫志》记载:“中国川原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而黄河被誉为四渎之宗、百水之首,早期人类“逐水草而居”的生存状态,使黄河流域成为中华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2]。黄河流域先民沿河经历异地安置、流动迁徙的过程中实现了文化交互与融合,塑造了底蕴深厚的中华文明。在黄河流域人类文明进化史上,多民族交替生息形成了多彩的文明廊带,如河套文明、仰韶文明、龙山文明、二里头文明、下七垣文明、岳石文明等,确证了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多层次文明发展格局。夏王朝的建立成为华夏文明传承与延续的重要标识,从启伐有扈、钧台之享等事件考证也可以得出,黄河流域体育文明由夏开启,经过殷商带有巫觋范畴意义的祭祀仪式、周朝宗法礼制改革以后,开始步入秦汉大一统时期的发展叙事。因此,夏商周秦汉时期体育文明是黄河流域体育文明的诞生与初步转型的关键期,对这一时期体育文明史的挖掘与

整理对于研究人类文明史、体育发展史均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宗教、仪式是黄河流域早期人类文明创造的标志性文化符号,如祭神、祭祖、祭天等原始宗教祭祀仪式崇拜活动上的巫觋、跳神等身体神性表达构成黄河流域体育文明的早期形态^[3]。夏商周秦汉时期历经奴隶制与封建制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以神权、皇权为主流的原始宗教神学思维引领下经历“巫统”与“血统”、“自发”与“人为”、“祀”与“戎”的交汇博弈,体育文明在宗教、仪式思维转向中也势必存在诸多假想与费猜,有必要加以厘定和澄清。研究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尝试借鉴史学研究中的二重证据法,该方法最早源自王国维先生《古史新证》中讲到的“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

收稿日期:2023-08-17

基金项目:2023年西安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23LW170);陕西省教育厅2021年度科研计划项目(21JJP099);2021陕西省科技厅社会发展领域一般项目(2021SF-51)。

作者简介:徐耀铎(1988—),男,山东泰安人,博士生,副教授,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

地下之新材料”，是将文献学、考古学两种研究方法相结合，通过发掘的出土文物和史书记载相互验证。二重证据法在20世纪得到了充分发展，被誉为中国考古学、考据学的重大革新，如陈寅恪对二重证据法的解释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进入21世纪，学术界借助二重证据法进行的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思想史、音乐史、文学史、民族志史、古文字、诗乐史、农业史等方面，但是关于文明史的研究尚未展开。籍此，需要立足考古与史料研究的“二重证据法”，探赜早期黄河流域体育文明的依附空间——宗教祭祀仪式，以考量体育文明史记忆演变的历史仪轨。

1 黄河流域体育文明滥觞之考辨：夏文明的形成与衍生

1.1 绝地天通：体育文明诞生中“巫”的角色

探索文明的诞生首先要厘清什么是文明。英国考古人类学教授丹尼尔(Glyn Daniel)认为，文明生成的标志包括文字、城市、复杂的礼仪中心等3大要素^[4]；另外，亦有学者将青铜器、文字、宫殿基址(日本历史学家贝冢茂树)或青铜器、文字、城堡(我国考古学家夏鼐)认为是文明诞生的标志^[5]。学术界通常认为华夏文明最早是在黄河流域出现的，而2021年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大量青铜器、玉器、石器的考古发掘，证实了夏商时期长江流域古蜀国宗教、仪式文明的诞生，两河流域同是华夏文明发祥地。基于文明的属性考量，从考古学角度认为在夏之前新旧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尚不具备文明属性，如裴李岗遗址作为黄河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尽管发掘的半地穴式建筑初现聚落布局，但文字的缺乏或只能称之为“前文明”“潜文明”^[6]。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可谓巫觋向文明转换的蝶变期，饱含浓郁的宗教、仪式文化色彩，如贾湖遗址出土的象牙雕板、骨笛、玉器、绿松石、骨珠、龟甲与响石，及内蒙古兴隆洼遗址、阜新查海遗址发掘的玉斧、玉铎等应为宗教祭祀仪式的“神器”道具，从而为黄河流域夏前先民占筮祭祀宗教、仪式活动事象提供重要明证。刘先琴等^[7]通过对贾湖遗址出土文物及刻画符号分析认为，贾湖先民就已经出现了巫术仪式和原始崇拜，是世界最早的原始宗教与卜筮起源地之一，开创了黄河流域早期文明。夏之前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拘囿于蒙昧

与蛮荒范畴，试图用“巫觋”思维方式达到“人神共通”，祈佑神灵庇护氏族繁衍、强大，由此连缀起原始巫术礼仪的侧影与想象。由此得出，原始宗教与巫术仪式的结合、巫术礼仪的出现构成黄河流域体育文明的早期形态。

夏前黄河流域“巫觋”盛行，巫、医、史、礼混乱造成“民神杂糅，不可方物”“人人可巫”的社会现状。据河南郑州东赵遗址考古发现的“小城”为新砦期城址，年代介于龙山时代和夏文化之间，城址南墙外集中发现了40余座灰坑，坑内发现猪骨架、龟壳、人骨等，考古推断应该与早期的“巫觋”祭祀活动有关^[8]，揭露了夏之前可能盛行的“巫觋”文化事相。关于夏之前的“巫觋”改革还要从颛顼帝开始推行“绝地天通”谈起。《尚书·孔氏传》记载：“帝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从而开启了上古宗教改革的先河，巫术仪式只能由官方专行，以此建构“天地相分，人神不扰”的社会秩序法则^[9]，为黄河流域祖先崇拜及宗教秩序建立奠定了基础，氏族贵族开始拥有独特神权，人神平等被“政巫合一”取代^[10]。许慎《说文解字》对巫的解释为“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巫同“舞”，在经历绝地天通之后，以舞降神的体育功能被放大。例如，在大型占筮宗教祭祀仪式上，《周礼》中记载说：“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云门》即“云门舞”(有祥云福佑之意)；《吕氏春秋·仲夏纪》记载的颛顼作“承云舞”及《仲夏纪》中记载帝尝“九招舞”等，以祭祀天神、上古帝王。古人试图借助原始舞蹈形式与神沟通，通过建立特殊的巫师阶层来维系原始部落关系，表达个体情感，这一过程中原始宗教和古老仪式主导的体育形态赋予了“巫”性功能化身，其在体育文明转换中发挥重要辐射和引领作用^[11]，但纯粹“巫”性范畴的体育事项尚不具备文明属性，黄河流域人类文明也只有经历巫觋成为首领，部落成为国家，卜具定为礼器，神秘的刻画符号成为文字以后，才能迎来体育文明的曙光。

1.2 启伐有扈：军事起源说

夏启打破禅让制，建立世袭制，开启中国古代第一王朝——夏，为维护王权稳定，建立正式军制，禹征三苗、启伐有扈均足见强大的军事力量。《左传·哀公元年》记载：“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

其谋”,实行兵农合一的兵役制度,以“旅”为军事编制单位,彰显“寓兵于农”“寓将于卿”军队组织特点。夏后氏首领启之父禹死后,启为夺华夏部落联盟首领之位,发动讨伐有扈氏战争,“启伐有扈”战争也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立国之战——甘之战。《竹书纪年》记载:“益代禹立,拘启禁之,启反起杀益,以承禹祀”,启的篡夺行为得到以有扈氏为代表的强烈反对,于是“大战于甘……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尚书·甘誓》),最终“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史记·夏本纪》),建立世袭王权,开创奴隶制的夏王朝。“启伐有扈”战争的发起源于有扈上不敬天象,下不敬大臣,伐之则代天行罚,召“六事之人”传达战争约戒,开创违背命令者将社坛处死的严明军纪,由此可见,“启伐有扈”战争本身具有极强的宗教色彩,从战争意义本身来说,世袭王权的建立打破了传统旧秩序,确立了奴隶制社会的夏王朝,为中国社会进入新的文明阶段发挥积极影响。部落之间的战争冲突在夏前就非常普遍,在文明生成三要素中,青铜器、文字在夏前就有存在,而城市、城堡或复杂礼仪中心的出现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建立以后。“启伐有扈”作为中国历史上极具标志性意义的立国之战,所以,提出文明由“夏”开启,体育文明也源于“夏”,且与军事战争有着密切关联的学术推断。

在经历启伐有扈以后,为巩固夏王朝专制政权,实施军事改革,夏朝军队平时从耕、战时从戎的兵役制度,推行卿、农等级组织管理结构、多兵种协同作战策略,及远程技击武器装备等。《世本·作篇》云:“奚仲作车”,《左传·定公元年》载:“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在兵种上开始出现车兵,实行“车驰、卒奔”也表明车兵与步兵协同作战。在武器装备方面,夏朝军队以远程弓矢和戈矛等长兵器为主,如偃师灰嘴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三棱尖戈(曲内戈、直内戈)、铜戈、石戈、铜镞、戚等。陈星灿^[12]通过对河南偃师灰嘴遗址发掘出土文物分析认为,在夏文明发展过程中技击性武器装备被广泛运用到军事战争。《吕氏春秋·先己》记载:“夏后伯启与有扈战于甘泽而不胜……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亲亲长长,尊贤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在启的军事治理中,“德与善”“亲长”与“尊贤”思想

构成军事文明的核心。“启伐有扈”战争赋予早期军事以文明属性,在这场军事改革的进程中,军事策略的出现,技击性军事装备的研制与更新构成黄河流域军事体育文明形成的原始基因,并在长期的军事战争中得以强化,这种寄生于军事战争的射箭、兵戈技击、车马骑乘等成为黄河流域体育文明发生的原初样态。

1.3 钧台之享:宗教祭祀仪式起源说

夏朝开启了华夏文明的肇始之初,考古发现提供了诸多证据。例如,黄河流域腹地的郑州市二七区古墓群发现刻有文字符号的印章和铜器,洛阳市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爵,甘肃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青铜小刀,传世的夏篆文字夏禹书、禹王碑,以及偃师二里头遗址大型都邑建筑基址群等,都是夏文化遗存,其中,夏朝鼎、彝、簋、豆等青铜器是早期宗教、礼仪、权力等符号象征,成为黄河流域文明产生的重要标志。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陈相龙等^[13]通过对偃师二里头遗址1号巨型坑祭祀遗迹的考古发现,二里头文化时期是黄河流域早期文明发展的重要阶段,是这一时期的文明是在王权控制下的高等级宗教祭祀与仪式性活动。宗教思维主导下的黄河流域文明张力试图摆脱蛮荒与蒙昧状态的“巫”性范畴,用标定的宗教祭祀仪式活动来满足个体的精神诉求,宗教观念由此诞生。

既然黄河流域文明诞生于夏,而夏前的体育是由巫术表演中的原始舞蹈(名为“傩”或称之为“巫傩”)派生而来,那么,黄河流域体育文明是否开启于夏朝呢?还需要从“钧台之享”宗教改革谈起。《左传·昭公四年》载有:“夏启有钧台之享”,夏朝启帝继位以后,召集各地方国首领,在阳翟(今河南禹州)设钧台祭祀上帝群神,举行盛大的宗教献祭仪式活动,这是黄河流域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开创的以神灵为崇拜对象的宗教仪礼,确立夏启“共主”地位,形成“家天下”局面。钧台之享作为黄河流域早期典型的仪式活动,在仪式活动上的舞蹈尽管并没有摆脱夏前原始舞蹈的“巫”性范畴,但对群神献祭舞蹈所表达的宗教情感已然超越了纯粹神灵救赎的意愿,而转向对人的教化功能,让人们产生对夏王朝权利、政治制度的价值认同,具有宗教祭祀仪式类的舞蹈构成黄河流域早期体育文明生成的母本基因。另外,钧台之享祭祀仪式活动上的“乐舞”在融入宗教

礼制文化以后,摆脱了颛顼时期单纯的“巫觋”体育范畴,试图用蹦、跳、踢、扑、抓、打等舞蹈动作来表现超然力量,赋予体育以神性象征,借助通神和情感操纵的形式力量达到对底层民众的全方位教化与规训,体育在宗教祭祀仪式活动上的功能被赋予更多政治符号^[14],发端于宗教祭祀仪式空间的体育文明表征了黄河流域先民精神信仰的秩序法则与规范体系。

2 夏商周秦汉时期黄河流域体育文明演化的宗教祭祀仪式表征

黄河流域在夏朝开启了体育文明,无论是用于军事战争的射箭、兵戈技击、车马骑乘,还是由“巫觋”演变而来的乐舞,这些早期体育形态组成黄河流域文明发展谱系的重要内容。通过上文对黄河流域体育文明滥觞考辨发现,其发生学解释为军事战争和宗教祭祀仪式两者存在不可须臾离的文化关系,正如《左传·成公·成公十三年》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燔,戎有受脤,神之大事也”,宗教祭祀和战争是古代国家的两件大事,战争中的祭祀之礼也是对神灵的崇拜,军事与宗教祭祀仪式活动不可分割,这也印证了上文黄河流域体育文明军事起源说与宗教祭祀起源说皆合乎情理性^[15]。考证夏商周秦汉时期黄河流域体育文明演化的具体表征,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夏商周(先秦时期文明)和秦汉(大一统时期文明),因为先秦文明的夏和殷商无论是军事战争还是祭祀舞蹈都没有摆脱巫觋文化的宏观涵摄,而周朝宗法礼仪制度主导下的射礼、六博、踰鞠等把体育文明推向新的阶段;而秦汉峙祭宗教、黄老崇拜道家宗教为核心的信仰体系,在“独尊儒术”文化侧映之下“修身”之学、“养生”之道成为引领体育文明发展叙事的主流话语。

2.1 夏商周:“自然宗教→多神教→宗法礼仪”管窥下的体育文明

夏朝作为黄河流域体育文明的开端,并伴随宗教改革而得以传承与延续,从夏启钧台之享到孔甲乱夏都堪称不成熟的宗教改革运动。钧台之享引发乐舞为主导的体育文明试图改变史前巫时代用跳傩的方式建立与神灵之间的身体联系,把巫觋文化发展为祭祀文化,但宗教祭祀舞蹈所表达的神鬼观念并未消除,《史记·夏本纪》载:“帝孔甲立,好方鬼

神”,这种宗教思维已难以合乎民众和诸侯的精神信仰^[16],从而导致“孔甲乱夏,四世而陨”(《国语·周语》)的结果。黄河下游商率方国于“鸣条之战”灭夏。商朝从“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玄鸟》)王逸《楚辞》、郑玄《礼记》中注解“玄鸟,燕也”,可以看出商有天神崇拜和鸟为图腾崇拜的宗教观,这一推测在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怪鸟、玉燕得到证实。在相关学术研究中,王莘通过对殷墟妇好墓的分析认为,黄河流域在红山文化时期原始宗教信仰发达,祖先崇拜、龙图腾崇拜成为商代祭祀活动的主要对象^[17]。另外,妇好墓作为大型祭祀宗庙建筑,出土的妇好汉白玉雕像及虎纹铜钺、龙纹大铜钺(军事王权符号象征),或受“女性为尊生殖崇拜”价值观念的影响,显现出殷商族人女神及武艺强者崇拜的宗教思维,《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说明商朝并没有完全摆脱巫觋观念。

河南郑州东赵遗址考古发现的城墙、城壕、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疑似祭祀坑区、灰坑、窖穴、水井等,以及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等夏、商、周时期的文化遗物揭露了夏朝区域聚落形态的城市文明,也为探索我国早期国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佐证。在宗教祭祀仪式上,夏朝将巫觋文化发展为祭祀文化,如东赵“中城”发现婴儿奠基现象,这在同时代的城墙修筑中极为少见,另外一处卜骨坑中,数十块灼烧过痕迹的卜骨密集摆放,童祭和批量卜骨的发现标志着夏朝大型宗教祭祀仪式活动的出现,构成殷商卜甲集中埋藏放置习俗(制度)的形成。在具体操作层面,演绎者试图用舞蹈演绎鬼神的身體“离场”是对外部世界缺乏解释力而形成的自然宗教思维,进入商朝的体育文明开始进一步淡化巫觋文化,在对多神崇拜的同时,又加入动物、人物(武艺强者),在实践身体“不在场”中进入多神宗教祭祀仪式活动域。周人继承商文化特点,但在宗教祭祀仪式活动上融入“礼”的规范体系,包括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各种礼仪,“蓑弘乃明鬼神事,设射狸首”(《史记·封禅书》)蓑弘在宗教祭祀活动上组织的“射狸首”仪式构成黄河下游流域体育“射礼”文明的重要内容,围绕社会伦理及宗法制度建立内容丰富的体育文明,正如《战国策·齐策》记载“临淄之中七万户……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

六博、踰鞠者。”并开始出现“祝、宗、卜、史”的分化,实现了对巫觋文化管窥下自然宗教和多神教的超越而进入一个新的宗法礼仪阶段。

2.2 秦汉:“封禅时祭宗教→儒道修身养生宗教”规制下的体育文明

秦灭周,中国进入“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结束了黄河流域混乱纷争局面,为维护政权稳定在继承殷周宗法礼制建制的基础上进行宗教祭祀仪式改革,统一信仰,广设宗庙,强化皇权独尊,遵循“一帝至上,群神并出”的“神权统一”宗教祭祀仪式法则^[18],开创时祭和封禅等祭天形式主宰的天神、地祇、人祖全方位的宗教主体框架和神灵系统,《史记·封禅书》载:“秦宣公作密时於渭南,祭青帝……秦灵公在吴阳设上时,祭祀黄帝;设下时,祭祀炎帝……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时栎阳而祀白帝……登封报天,降禅除地”,另《管子·封禅篇》中也有无怀氏、羲、神农、炎帝、黄帝、颛顼、帝喾、舜、禹、汤、周成王等皆受命然后得封禅,印证了《史记·封禅书》记载的“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说明秦封禅时祭宗教源自天地崇拜,是远古暨夏商周的遗留或蝶变,秦人对青帝、黄帝、炎帝、白帝宗教崇拜可能与殷周祭四方之神有关,显然封禅时祭宗教已然僭越了周礼,确立了以天地、时祭为核心的信仰体系^[19]。而在封禅时祭宗教规制下的黄河流域体育文明的表征,还需在封禅时祭宗教文化活动中探寻答案。封禅时祭文化是秦人崇神、宗教思想的反映,在仪式开始前要进行巡狩,“帝启十年,帝巡狩,舞《九韶》于大穆之野”(《竹书纪年》),巡狩活动早在夏启时期就开始出现,并同乐舞密切关联,然后从泰山之阳登上山顶进行拜祭封礼,源于早期人类对自然山川的崇拜,是一种原始的祭天仪式,自秦始皇历代封建帝王对封禅泰山都非常重视,尤以秦始皇、汉武帝封禅及时仪式最为隆重。秦始皇作为第一个泰山封禅的封建帝王,采用秦国雍祭祀天帝的形式完成“封礼”,正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八年,始皇东巡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史料中秦始皇泰山封禅祭祀活动有“立石”以颂秦德记载,这在考古发掘的石刻中得以证实,如现存岱庙东御大殿露台前西侧的石刻也有秦始皇封禅泰山完成“禅礼”的记载。

另外,在陕西省陈仓县石鼓山发掘的《石鼓文》也记述了秦王出猎的场面,又称“猎碣”,构成“禅礼”宗教祭祀仪式活动的重要内容。章太炎在《封禅》中认为“封禅为武事,非为文事”,为防戎马侵扰而组织的大型宗教时祭仪式活动,“武事”文化赋予黄河流域体育文明更多的政治功能,巡狩、乐舞、登山、拜祭等体育活动构成秦封禅时祭宗教的重要内容。

秦末农民起义四起,经楚汉之争,刘邦登基后恢复礼法,卜筮、占星、望气和风角等各类术士遍野,崇尚休养生息的黄老学派有力推动了黄河流域体育养生文明的诞生。黄老学派把形而上本体的道与形而下的养生、方技、数术、兵法、谋略相结合^[20],是先秦老庄之学子遗,在同各类神仙方术相结合的进程中,吸收借鉴阴阳、儒、法、墨等宗派,汇合孕育了道家宗教思想。黄老道家主张治身治国,“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成为黄河流域早期体育养生文明的核心要义,开创了吐纳之术、养生之法,如《庄子·外篇·刻意》载:“吹响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伸),为寿而已矣”,导引术另在《引书》《导引图》中也均有记载,确立了体育养生、养长、养收、养藏之道。汉武帝即位后废除“黄老宗教、无为而治”,崇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成为宗教正统,“天人合一”生命哲学观倡导强身健体、生命养生、道德教化相融合,以达到国泰民安的宗教政治诉求^[21],“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价值追求对黄河流域体育精神文明产生巨大影响。汉朝以儒道修身养生为核心的体育文明诞生源于对先秦宗教祭祀仪式文化的认同与复古,其中所蕴含的健康生命与道德生命甚至在当下体育文明中仍发挥持续影响力。

3 夏商周秦汉时期黄河流域体育文明的哲理阐微

3.1 夏商周体育文明表现为意识主导下的“祛身化”

夏商周时期黄河流域宗教祭祀仪式活动中的神鬼概念根深蒂固,其在对体育文明的影响表现为依然没有摆脱史前巫觋文化的统摄与管窥,天地崇拜、动物图腾崇拜、神灵崇拜等宗教祭祀仪式空间中的体育文明并未独立出来,而是作为宗教祭祀仪式组织程式中的一部分客观存在,各类巫觋特质的原始宗教舞蹈及射礼、六博、踰鞠等开创黄河流域先秦体育文明。在体育活动中,身体作为建立神界与人界

之间联系的媒介,身体的神性功能被放大并赋予了特定的符号意义^[22]。沿着“身体现象学”致思趣向,把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作为夏商周时期黄河流域体育文明认识哲学的逻辑起点,运动态身体存在的意义在于心理或情绪的一种表达,用“后意识哲学范式”关照体育文明,其发轫之初扬“心”抑“身”、尚“思”去“身”为意趣导向^[23],表现为体育文明的“祛身化”色彩。

夏商周时期黄河流域体育文明受巫性思维范畴的影响,身体被巫化以后赋予了“绝地天通”的神性功能,而实然性意义上脱离了生命本体的健康属性,亦即体育文明被巫化了。夏朝以“乐舞”为载体的体育文明尚未摆脱史前巫觋文化影响,在自然宗教主导的祭祀仪式活动中,军事体育依然无法逾越宗教行为框架。按照自然宗教祭祀仪式法则建构的军事体育文明与宗教祭祀体育文明由于受史前巫觋文化的统摄影响,在宗教祭祀系统中的神灵被幻化为族群祖先化身,确证以“巫统”为核心的信仰体系^[24]。商朝多神教主导下用舞蹈演绎鬼神,甚至把“玄鸟”幻化为祖先的宗教观更是突出了“巫统”地位;周朝体育文明在延续殷商宗教祭祀仪式文明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宗教礼法重构信仰体系的秩序法则,体育文明在内容上除军事、宗教祭祀仪式色彩以外,开始出现反映人们生活状态的趣味性、竞技性体育活动(如斗鸡、走犬、六博、踰鞠等)。夏商周时期黄河流域用祭祀性舞蹈来表达对“巫统”层面的“天神”崇拜,这也决定这一时期的体育文明尚未摆脱巫性范畴,而舞蹈仪式活动的功用性目的在于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来建构身体符号,在“天、地、人三才之道”哲学命题中凸显人之身体“绝地天通”的神性功能。夏商周时期黄河流域宗教祭祀仪式舞蹈尽管表现出了身体在场,但身体依然受制于意识主导,从体育学层面上被“健康塑造”的身体属性并没有体现出来,身体更多是沟通人神的工具、神的化身、祛厄禳灾的巫觋等,这种被意识主导的身体退隐构成体育文明“祛身化”的实然性表征。

3.2 秦汉体育养生文明实践了身体本位回归

秦汉时期黄河流域体育文明俨然是在封禅时祭宗教、儒道修身养生宗教规制下,在天神、地祇、人祖崇拜主导的宗教祭祀仪式框架下信仰系统僭越了周礼,其中,秦人在追求以人祖(四帝)时祭崇拜为

核心的封禅仪式活动中,崇拜对象也由殷周时期的“神权”逐渐向“皇权”过渡,所崇拜的神也更加实体化(青、黄、炎、白四帝),在封禅“武事”文化主导下巡狩、乐舞、登山、拜祭等构成秦朝体育文明的重要内容。《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有“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说明从秦朝开始追求身体健康修炼,探索长生不老的养生之道,这对汉朝黄老学派吐纳之术、养生之法道家宗教体育文明思想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秦汉时期黄河流域在封禅时祭宗教及儒道修身养生宗教引领下的体育文明改变了夏商周时期“意识”主导下“身心二分”的认知状态,开创了“存思、坐忘、守一、导引、吐纳”于一体的生命哲学范式^[25],试图追求“肉体永生”,把“得道成仙”看成身体修炼的最高境界,在追求健康生命与道德生命论域的“遇仙模式”中实现“思在合一”与“身道合一”,秦汉时期黄河流域体育文明表征试图通过身体“在场”的教化修炼,摒弃意识主导的身心二维态,实践着身体本位的回归。

秦时黄河流域宗教改革运动中,按照“神权统一”祭祀仪式法则,从时祭和封禅中“天神、地祇、人祖”的宗教主体框架也可以看出应当是殷商“天、地、人三才之道”认识宗教的传承与延续,特别是人的神性功能被放大以后,人成为沟通阴阳两界、和谐共生、万物繁衍之本,试图用“人创世之说”论断发起宇宙起源的天地混沌说的挑战^[26],借助内在情感意识信仰力量驱动实现对外部的形式操纵,由此形成了以“血统”为核心的宗教改革运动,秦人把青帝、黄帝、炎帝、白帝作为血缘祖先的崇拜正是如此说明。秦时黄河流域以“血统”秩序建立的宗教祭祀仪式秩序突出了帝王“绝地天通”的神性功能,原始的“巫统”秩序被打破,“血统”主导下试图用“虚构”的身体符号实践“神人”嬗变^[27],借助“封禅”大型宗教“武事”时祭仪式报帝王治世之伟业,仪式上巡狩、乐舞、登山、拜祭等活动所呈现的体育文明实践了人神沟通、上下交感的精神境界,表达“血统”关系的人祖与天神、地祇和谐共生的宗教生态。进入汉朝以后,黄河流域帝王统治者在族群“血统”思维范式里,生命个体作为神的化身虚构不可能逾越天神、地祇神灵系统,在对血缘祖先宗教祭祀崇拜的同时,开始追求健康长寿秘诀,特别是受儒家修

身、道家黄老学派养生文化的影响,构建了以“儒学修身、道家养生”为核心的体育文明。儒家经典《礼记·大学》载:“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作为立世之本,试图在“德仁修养”中重建道德生命的秩序法则^[28],由此黄河流域所崇尚的“修身”生命哲学被列入体育道德文明论域,而道家养生哲学更倾向于“返璞归真”,改变了秦朝体育文明“虚构”的身体符号属性,在完成健康生命的自我修复中实现由“生”(肉体生命的生存状态)向“生生”(自然生命的循环往复)的转向。

4 夏商周秦汉时期黄河流域体育文明举隅之“二重证据法”

4.1 巫觋文化:巫傩舞蹈派生的体育文明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黄河流域在华夏人类文明史上可谓承上启下的重要支点,宗教祭祀作为群体性仪式活动已走进人类生活,如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发现的仰韶文化时期“人面鱼纹”与氏族部落举行重大宗教祭祀仪式活动有关,可能是巫师头部佩戴的面具符号^[29]。另外,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石峁古城遗址皇城台发掘的神面、人面雕刻等,研究认为,黄河流域文明产生之前出现的面具符号是“宇宙混沌之说”向“天地阴阳两仪”转向的产物,是史前巫觋文化中“巫傩”演绎者试图通过假面阴阳面具改变人的形象,置于人神、阴阳两界身份象征,以面具替代神灵的遗绪,试图通过“内视象”进入灵魂世界,行沟通阴阳之事^[30]。黄河流域宗教祭祀仪式活动可追溯到史前时代,“巫傩”舞蹈成为原始体育的早期形态,这种活动是一种头戴面具,用舞蹈形式驱鬼逐疫的宗教祭祀仪式,这一时期的体育尚不具备文明属性,直到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夏代都邑”的出现开启了黄河流域文明史的探索历程,体育文明也由此诞生。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宗教祭祀遗迹圆形“坛”、长方形“墀”,推测可能为祭祀天神、地祇所用,正迎合《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记载的“如诚天圆而地方”之说,发掘的二号宫殿为宗庙建筑,是为祭祀祖宗之处,另出土祭祀器物青铜爵与宗教祭祀有关,玉圭、玉刀、玉戚、玉管、玉柄、绿松石等是夏商礼仪文明明证,武器戈、戚、镞是为军事体育文明发展标志性符号象征,乐器铃实然与乐舞(巫傩子遗)相合,由此开启了黄河流域宗教祭祀、军事体

育于一体的文明生态,在巫觋文化向宗教祭祀礼仪文明转折的进程中,使作为最直接的中介巫觋演变为天神、地祇、人祖概念的初步进化,实践着巫觋文化向体育文明的转向。

在传统华夏文明史上,巫术意识与崇尚自然的宗教思维影响下,巫傩舞蹈的出现应当说对于黄河流域体育文明的开启极具标志性符号学意义,因为巫傩文化在黄河流域(山西、陕西、甘肃等省份)非常普及并延续至今,其在长期的历史流变中塑造了极具民族特色的民俗体育文明,如甘肃文县的“傩舞池哥昼”又称“鬼面子”“白马面具舞”,是古白马族遗存。《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白马最大,皆氏类也”,从先秦至秦汉时期,氏族广泛分布在秦陇、巴蜀之间。白马族及祖先受周代“大傩”“乡人傩”影响开创了巫傩舞蹈,其作为集舞、歌、乐于一体原始古朴的群体性宗教祭祀舞蹈,具有拟兽舞蹈特征,可谓远古“百兽率舞”遗存,“池哥”形象凶猛恐怖,舞步遒劲粗犷,现代文县“池哥昼”依然延续早期的表演风格,舞姿更加丰富(有杀野猪、打老虎、剥猴皮等),角色扮演也更加多样化(山神、菩萨、小丑等)。另如,山西省寿阳爱社傩舞是夏商周秦汉时期黄河流域极其古老、原始的一种民间舞蹈形式,巫傩舞蹈形式演绎“轩辕大战蚩尤”的传说,展现远古人类傩文化宗教信仰崇拜意识,现存的表演形式依然延续原始风格,如“武势”“倒上墙”等表演形式表达祭祀和祈雨等场面。从黄河流域巫傩舞蹈表演的艺术风格来看,表演者佩戴极具夸张的面具来表达族群的图腾崇拜,为传承与传播黄河流域体育文明提供了重要的文化空间,这在诸多考古发掘的面具符号中也得以证实,如郑州商都遗址出土的“金面具”、汉中城固县苏村出土的青铜人面辅首、汉中洋县马畅镇出土的商代铜人面具,等等,这些早期与巫傩有关的面具符号无不印证着黄河流域由巫傩舞蹈派生的体育文明的具体表征。

4.2 “祀”与“戎”:重武习射、图腾崇拜为核心的体育文明

“祀”与“戎”作为夏商周时期黄河流域最为重要的国之大事,如河南瓦店遗址发现夏代早期大型祭祀遗址“墀”的建筑,《礼记·祭法》记载:“封土曰坛,除地曰墀”,“坛”和“墀”均为祭祀之所,所以,黄河流域考古发现的“墀”是为祭祀地祇的设施。又

如,河南济源柴庄的遗址发现了大量晚商时期的墓葬与祭祀遗存,从祭坑骸骨摆放造型如甲骨文中的“坎”字,据甲骨文记载,商朝盛行人祭文化中“坎”代表着祭祀月亮。事实上,舞蹈在夏商周时期祭祀活动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祭祀所用的乐舞、服饰与礼器都非常讲究,如瓦店遗址出土的与祭祀有关的礼器——陶鼎、陶瓮、盃、鬯、列觚、杯、豆、盘、壶等,这种在祭祀仪式上的舞蹈表达了黄河流域先民以天地(天坛、地壇)、自然(月亮)为图腾崇拜的体育文明表征。夏商周时期与“戎”有关的体育文明可以从出土的诸多兵器得到证实,其中,戈是夏商周三代黄河流域最为重要的军事装备。例如,二里头三期直内戈(商前期)、曲内戈(商后期)、安阳市洹北商城遗址出土直内无胡戈(商中期)、直内有胡戈(微胡、短胡、中胡、长胡),印证了这一时期步兵军事武学主要采用挥动手臂啄击的攻击方式,另外,太原市金胜村东周赵卿墓出土虎鹰互搏釜内戈、妇好墓出土虎纹铜钺也为前文虎图腾崇拜(祀)与军事(戎)空间载体的体育文明提供重要实物佐证。关于“祀”与“戎”宗教祭祀仪式的史料记载中,可在祭祀歌乐《商颂》中探寻答案,开篇《那》载,“庸鼓有数,万舞有奕”;《烈祖》载,“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将”;《殷武》载,“挾彼殷武,奋伐荆楚”。描述了商朝气势恢宏的歌舜伎乐祭祀场景,以及殷王武丁兴师讨伐荆楚征战前后的宗庙祭祀仪式活动。“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乎社而后出,谓之宜”(《尔雅·释天》),“宜,出兵祭社之名”(《春秋左传正义》),“帅师者,受命于庙,受赉于社”(《左传·闵公二年》)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周礼成为国之大事公元前578年刘康公组织诸侯会盟,出兵伐秦前行祭社之礼^[31],“祀”与“戎”引领的周礼成为军事、宗教祭祀仪式法则,印证了“以军礼同邦国”(《周礼·春官》)之说,《尚书》中《甘誓》《汤誓》《牧誓》都有命将出征的祭祀仪式记载,以及强化军事训练,“军事以严终”(《穀梁传·庄公八年》),春秋经传记中天子“亲讲武”之事甚多。

《孟子》《汉书·儒林传序》《礼记·王制》《明堂位》《说文解字》等史书文献典籍中记载了殷商时期教育描述有“殷曰序”“殷曰庠”,殷有“右学”和“左学”,殷学为“瞽宗”,即:“序”“庠”“学”和“瞽宗”4类教育机构,“庠”“序”是在夏朝基础上形成的,以国家“祀”(祭祀)和“戎”(军事战争)为中心开展礼

乐、舞蹈、军事活动等,而这一时期教育中礼乐、舞蹈并没有明确的界分,如《礼记·明堂位》记载:“而作乐于瞽宗”。到了商代,“庠”除了作为伦理道德教育以外,还是开展习射、射礼教育的地方,甲骨文关于“庠”的记载中也有教练射箭的描述。“序”的教育除教授习射以外,还有“武舞”的记载,在“序”不仅学习射箭技术,还要学习射礼仪式,以明确君臣、长幼之间的礼仪、礼节关系。“瞽宗”原是宗庙,是教授贵族子弟接受礼乐教化、道德修养的重要教学场所,尽管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未见“序”及“瞽宗”的记载,多有“教”与“学”字样,如“丁酉卜,其呼以多方小子小臣,其教戒”,这一卜辞中“教”的对象为“戒”,“戒”字形如人手持戈而戒或舞蹈,教学的内容除宗教、道德伦理、礼仪以外,还有习武与习舞的内容,这也正好印证了殷序习射、瞽宗习礼乐的学理推断,由此形成了殷商以“重武习射”为核心的体育文明。

夏商周时期黄河流域与军事、宗教祭祀仪式活动有关的体育文明在诸多考古学中也得到证实。天水放马滩发掘的M14秦墓板画为战国中期遗存^[32],板画正面系虎图像,背面为六博局图,揭示了在周朝虎图腾宗教祭祀与博戏有关的体育文明。《楚辞·招魂》记载,“菝蔽象棋,有六博些”,博戏成为周朝人们喜爱的体育游戏活动,把虎图腾崇拜与六博四象进行组合刻画也进一步证实体育文明与宗教祭祀仪式有关。首先,六博棋盘源于太极八卦图设计,《易传·系辞上传》载:“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黑白棋子为两仪阴阳鱼,四角为阴,四边为阳,四个圆点为四象,是由天地(阴阳)宗教祭祀演变而来;其次,《礼记》载,“前朱鸟(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三辅黄图》载,“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四象”又称“四灵”,说明虎图腾崇拜也与六博四象有关,证实了宗教祭祀仪式活动与体育文明存在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4.3 “雅”与“俗”:宗教祭祀仪式“退场”后的多元体育文明

从语言学文化视角来看,“雅”与“俗”皆源自“风”,但在演进进程中出现两类截然对立的文明路向,表现为以“雅”与“俗”为核心的上层语言和下层语言概念关系。体育文明由夏开启,经过殷商、春

秋、战国的迭代更变,进入秦汉时期,黄河流域体育文明尝试摆脱宗教祭祀仪式束缚,而进入由多元体育文明共同谱写的“后世体育”发展格局,在体育文明发展史上属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秦汉时期黄河流域体育文明除了继承夏商周宗教祭祀、军事为传承空间的体育文明以外,在封建制度基本形成与发展中新的体育活动陆续产生,寄军事体育训练于娱乐(击剑、步射、角抵、摔跤、赛马)、宗教祭祀于养生(导引、乐舞、驱傩),以及其他体育“百戏”活动,如蹴鞠、投壶、跳丸、跳剑、弄壶、杂技、吐火、倒立、冲狭、鱼龙漫延等,开创了“重文士轻武夫”“雅”与“俗”共赏的体育文明。

在由“雅”主导的上层统治阶级体育文明中,士大夫们“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后汉书·祭遵传》)《西京杂记》将投壶谓之“骹”法,《大戴礼记》《礼记》著有《投壶》记载,秦汉时期投壶已成为士大夫和上层阶级文人雅集的游戏;关于宫廷射礼的记载,《通典·军礼》《后汉书·明帝纪》均有“宫廷有大射之礼”之说;秦汉继承商剑文化遗风,皇室贵族、士大夫有佩剑习惯,击剑之风盛行,习剑术之人谓之“剑客”,如《盐铁论·箴石》有云,“若夫剑客论,博弈辩,盛色而相苏”,开创了以击剑武学为核心的体育文明。另外,河南济源市泗涧沟出土的汉代投壶、南阳出土东汉贵族“投壶饮酒图”画像石、秦俑坑内发掘的精良宝剑等,无不印证了秦汉时期黄河流域投壶、射礼属于“雅”文化范畴的体育文明,这类文明的弊端在于通常会伴随政权的更迭而被新的政治文明所取代,但能够得以传承并保持持久生命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雅”与“俗”转向或共生中得到底层民众的价值认同。秦统一六国后,一些宫廷体育娱乐项目开始在民间得到发展,以角抵戏为例,角抵戏亦称“角抵”,正是《述异记》中记载的“以角抵人”之义,该项活动起初用于战争的作战技能,后又演变为民间竞技,带有娱乐性质的民间表演艺术,并被纳入“百戏”范畴。《西京赋》记载了汉代长安“扛鼎”“缘竿”“钻圈”“跳丸剑”“走索”“鱼龙变化”“吞刀吐火”“划地成川”等百戏活动。《汉文帝纂要》载:“百戏起于秦汉曼衍之戏,技后乃有高絙、吞刀、履火、寻橦等也。”秦汉时期的“百戏”中就有角抵戏,如《文献通考》记载:“秦并天下……讲武之礼,罢为角觝”,《汉书·刑法志》也记载:“春秋

之后……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而秦更名角抵”,但汉时的“角抵戏”开始深受民众喜爱,《汉书武帝纪》中记载:“元封三年春,皇家在京师举行百戏,三百里内皆(来)观”。可见,角抵戏起源于秦而盛行于汉,且秦时讲“武”(搏击)而汉时讲“艺”(表演)。黄河流域诸多考古发掘也对秦汉时期角抵体育文明发展延续提供佐证,如山东省临沂金雀山汉墓角抵绢画、河南密县打虎亭2号东汉墓角抵壁画、陕西长安客省庄汉墓角抵铜牌等。

周朝把宗教祭祀和军事作为国家最为重要的两件大事,由宗教和军事衍生的体育文明早期发生在宫廷上层统治阶级阶层,赋予这一时期的体育以“雅”文化特质,然随着底层“俗”文化的兴起,加上宫廷“雅”文化主宰的体育活动影响,促进了黄河流域百戏的产生,特别是汉代百戏文化达到了顶峰,呈现出“雅”与“俗”并轨的发展格局,黄河流域体育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在遭遇宗教色彩淡化之后,趣味性、娱乐性、养生性的体育活动开始备受追捧,底层民间体育活动的广发兴起,由“雅”与“俗”主导的体育文明在相互博弈中“俗”文化更易于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形成了比较稳固的文化遗产空间,使黄河流域诸多百戏中的民俗体育得以传承至今。据山东沂南北寨考古发掘的汉百戏画像石表现的内容来看,有舞蹈(独舞、双人舞、群舞三种类型的盘鼓舞,及用于祭祀舞蹈表演建鼓舞)、飞剑跳丸(飞剑与弹丸两种百戏技艺融合)、寻橦(类似爬树的表演)等多种形式,表演者用极具表现力的翻、旋、跳等舞蹈动作,结合舞剑、跳丸、变鱼等多种题材,实践着早期民俗体育与舞蹈、音乐、杂技融为一体的探索历程。从沂南北寨百戏画像所折射出来的文化理念来看,乐舞表演活动符合汉代以舞祭祀、与神明交流的宗教祭祀情感,其所表现出来的体育文明张力打破了周朝雅乐统治的局面,开创了以俗乐艺术为创作基础的百戏文化,实现了黄河流域“雅”与“俗”两类文化共同作用的体育文明发展谱系。

5 结语

通过对黄河流域华夏文明进行梳理发现,夏商周秦汉时期是文明诞生与初步转型的关键时期,且从大量史书典籍和考古学发掘中都有体育文明发展的遗痕(如巫觋舞蹈、军事武学、射礼、六博、导引

等),然这一论域并未引起学界关注,可直接参考学习的资料也不多见,从而加大了研究考辨的难度,为此,本研究尝试借用历史学研究的“二重证据法”将黄河流域体育文明史置于宗教祭祀仪式空间,辨识和厘清华夏早期体育文明史演进的“应然”表征,籍此以求证于大方之家。

参考文献:

- [1] 王清月.黄河流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评《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J].人民黄河,2020,42(11): 173-174.
- [2] 权小芹.黄河流域史前聚落的形成及历史变迁——评《黄河文明的历史变迁:黄河流域史前聚落与城址研究》[J].人民黄河,2023,45(7): 166-167.
- [3] 刘欣然,黎纤.“文明”与“野蛮”的论辩——基于对立统一思想的体育哲学考察[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22,38(1): 26-35.
- [4]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 [5]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 [6] 李玉洁.华夏文明最早在黄河流域形成[J].华夏考古,2011,98(4): 44-50.
- [7] 刘先琴,万雪琪.一座古中国文明的富矿[N].光明日报,2013-11-12(009).
- [8] 杜洁芳.夏朝真实存在的考古探索[N].中国文化报,2015-04-20(007).
- [9] 郭军,仇军,田恩庆.仪式体育与社会记忆的保存和传递——康纳顿社会记忆理论的视角[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5,41(5): 44-48.
- [10] 周书灿.中国文明起源黄河流域中心说到多元一体说的理论演变——学术史视野下的新考察[J].西部史学,2017: 11-33.
- [11] 闫艺.历史人类学视域下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流变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9(1): 32-40.
- [12] 陈星灿,李永强,刘莉.2002-2003年河南偃师灰嘴遗址的发掘[J].考古学报,2010(3): 393-422,433-442.
- [13] 陈相龙,李志鹏,赵海涛.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1号巨型坑祭祀遗迹出土动物的饲养方式[J].第四纪研究,2020,40(2): 408,410-417.
- [14] 张劲松.娱神与竞技体育与宗教关系的文化阐释[J].中国宗教,2014,178(9): 56-57.
- [15] 张彤,杨嘉民,常华.神圣与世俗的组构:仪式体育的身体操演变[J].体育与科学,2015,36(6): 53-57.
- [16] 汪波.互为镜像与复调:宗教与体育的悖谬性超越[J].体育与科学,2016,37(4): 48-52,120.
- [17] 王苹.妇好墓出土人像及相关问题探讨[J].博物院,2018(5): 51-57.
- [18] 杨海晨,吴林隐,王斌.走向相互在场:“国家-社会”关系变迁之仪式性体育管窥——广西南丹黑泥屯“演武活动”的口述历史[J].体育与科学,2017,38(3): 84-93.
- [19] 段丽梅,杨小凤,张伟,等.传承与俱进:民俗体育文化认同的现代化路径分析——以非遗项目花棍舞(打莲湘)为个案[J].体育学研究,2016,30(2): 38-42.
- [20] 郭娟.祖先崇拜与中华传统民俗体育活动的价值认同研究——基于传统龙舟竞技仪式的分析[J].体育与科学,2023,44(4): 95-100.
- [21] 闫静.体育运动与宗教庆典关系变迁的镜像考察[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1,47(4): 61-65,99.
- [22] 刘欣然,高楚兰,张娟.体育“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哲学认识[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1,55(6): 14-21.
- [23] 郭军,仇军.仪式体育:作为身体实践的族群记忆[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6,50(12): 13-17.
- [24] 谢霞,徐昶楠,施丹萍.国外体育象征与仪式研究特征及转向[J].体育文化导刊,2019,201(3): 40-45.
- [25] 白晋湘.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建设的使命与担当[J].体育学研究,2019,2(1): 1-5.
- [26] 何胜保,高红斌,杨春,等.融摄与对话:《周易》哲学对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影响发微[J].体育科学,2013,33(10): 93-97.
- [27] 吴莲花.边界与融合:关刀文武灯阵仪式体育参与者的身体展演与话语叙事[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2,48(4): 71-76.
- [28] 台文泽.身体竞技与乡土秩序:“斩马路”仪式的体育人类学研究[J].青海民族研究,2023,34(1): 151-160.
- [29]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
- [30] 何胜保.仪式体育:北方巫雉与滦河流域萨满跳神宗教祭祀研究[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21,35(4): 89-96.
- [31] 王学军,贺威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原始语境及其意义变迁[J].古代文明,2012,6(2): 92-98,114.
- [32] 姜守诚.放马滩M14秦墓板画中的宗教信仰[J].老子学刊,2014(6): 77-95.

(下转第106页)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13 to 2020, this paper uses entropy weight-TOPSIS metho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ree model, spatial measurement model and other methods to explore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ter-provincial mass sports and competitive sport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① Under the guidance of policy, regional coordination and market demand, both mass sports and competitive sports in China have developed rapidly, and the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them shows a narrowing trend. However, spatiotemporal heterogeneity exists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regions. ②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 coordination level of inter-provincial mass sports and competitive sport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the barely coordination stage to the primary coordination stage, forming a spatial distribution feature with key coordination points generating development momentum for surrounding areas. Howeve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has some shortcomings, and its form shows significant stage characteristics, generally evolving from the relative lag of competitive sports to the relative lag of mass sports. ③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ter-provincial mass sports and competitive sports shows a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which gradually increases. Internal and external driving factors such as government attention, amount of sports lottery public welfare fund, population size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On this basis, it is proposed to take the surrounding projects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complete the short board of mass sports development; tak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the guidance, driv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sports; and break down the barriers to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ased on two-wheel drive and two-wing resonance.

Key words: a leading sporting nation; Healthy China; national fitness campaign; mass sports; competitive sports; public service system

(上接第 39 页)

Sports Civiliz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during the Xia, Shang, Zhou,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Dual Verification” Originating from Religious Sacrificial Rituals

XU Yaoduo^{1,2}

(1.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72,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By using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historical analysis, cultural narrative, and dialectical analysis, and through the mutual verification of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literature material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origin, evolution, and cultural philosophy of sports civilization, and adopts the “dual verification” method to outline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early sports civiliz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formation of sports civiliz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was influenced by the reform of the “extreme heaven communication” witchcraft. It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historical events such as “Battle against Youhu” and “Juntai Rites” during Xia dynasty that the two major theories of military and religious rituals constitute the origin of sports civiliz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e sports civiliz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during the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was nurtured in the changes of natural religion, polytheism, and ritual etiquette. The religious rituals of enfeoffment and sacrifice as well as the Confucian and Taoist self-cultivation and health preservation religions were the cultural spaces that dominated the continuation of sports civilization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sports civilization of the Xia, Shang, and Zhou period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was manifested as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dominance of consciousness, while the sports and health civilization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practiced a return to the body-centric approach; the transformation of witchcraft into the concepts of heavenly gods, earth spirits, and human ancestor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practices the transition from witchcraft culture to sports civilization. Sacrificial rites and military ones as well as elegance and vulgarity represent the cultural logic behind the birth of diverse sports civilization of martial tradition, totemic worship of sports civiliz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religious ritual ceremonies.

Key words: history of sports civilization; Yellow River Basin; Xia, Shang, Zhou, Qin, and Han Dynasties; religious rituals; archaeology; dual verification